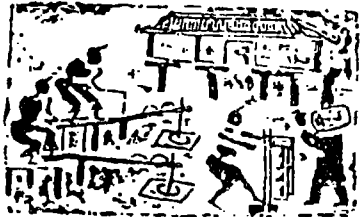


○ 眸子

具有当代学术意识的 《古汉语词汇学简论》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凝聚着民族的历史与智慧，因此，历来为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工程。历史上的硕贤鸿儒在研究古代汉语词汇方面作出了诸多贡献，然而这种研究是包容在训诂学中的，因此其研究不系统不全面，并未建立起一个古代汉语的词汇学体系。这不能

不说是古代汉语研究中的一大缺憾：

周光庆在古汉语园地中勤耕不辍，春秋十易，著就《古汉语词汇学简论》一书。该书以系统论思想作指导，引进当代语义学理论，充分吸收前贤世哲的研究成果，以当代的学术意识探索建构一个古汉语词汇学框架是很值得称道的。

—

《古汉语词汇学简论》所致力探索建构的框架，具有表里璧合、双线交互、多面兼顾的特点，体现了系统论的指导思想。

1·1词是由词形（读音、字形）和词义两部分有机璧合而成的，词形是表，词义是里。表里结合，分论而不分割，是该书的一大特点。该书在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详细考察了词的语音形成和书写形式，第二章以五节篇幅细致入微地察析词义，形成了表里分论格局。但是，在具体研究表、里时，又常常是相互蛛连。例如古有“转语”之说，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语音会有变化，这是“历史转语”；词因方言区的不同而读音有异，这是“方言转语”。这些因时因地而音异的转语之所以看作同一个词的不同存在形式，就是以词义作为红线串合起来的。

再如在谈到词的书写形式时，把词形构造与词义构造进行比较，显发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微妙联系。如“绝”，其词义结构为：

1用刀。2割。3断开。4丝织物。

其字形结构为：

1左边为两束“丝”。2右边为“刀”。

3“刀”已把“丝”断开。

这种字素和义素之间的对应比较，说明作者在究“表”时不忘“里”。表里结合，相得益彰。

在研究词的意义时，作者也常常结合词形。如作者在讨论考求本义的一般方法时，继承了文字训诂大家段玉裁的主张，把“因声求义”，“以形索义”作为考求本义的重要手段。这说明作者在究“里”时不忘“表”。

以上举例，乍看起来似乎只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手段，其实作者之所以自觉的以此手段来解决具体问题，正表明了作者既看到了分别探究表里的必要，又明审表里之间的辅成关系。因此使整个框架显示出表里璧合的特点。

1·2古汉语词汇上下延绵几千年，统而观之，古汉语词汇学属于断代词汇学，因此应进行共时描写。但是细而察之，古汉语词汇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因此也应进行历时画踪。共时是横截线，历时是纵剖线，横纵双线交互，构成了古汉语词汇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较为清醒地把握了古汉语词汇的这一特点，以共时描写为主经，又不断以历时画踪为辅纬，从而使整个体系显得丰满细密，较好地描画了古汉语词汇静、动两种面貌。

这种双线交互的模式，不仅表现在有专门的共时静态讨论，如词汇的组成、古汉语构词方式、词义的构成与特性等，有专门的历时动态讨论，如词汇的发展、词义演变的原因和结果、词派生新义的主要方式等，而且几乎在其它节次中也往往体现出动静结合的指导思想。

词的书写形式一节，是本书颇具特色的一节。作者把古汉语词汇的书写形式概括为：

- (一) 以其形体结构表现词的本义的表意字；
- (二) 以其形体作为音节符号的假借字；
- (三) 以其形体结构表现词的意义类别、记录词的语音形式的形声字。

这种概括打破了传统“六书”的成说，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能较好体现书写形式记录词的特点。这三种形式从总体上来看，是一种共时的描写，但是，作者在叙述中是把这三种形式安排在记词方式发展的历史序列上的。当字从图画文字阶段走出来之后，首先采用的是表意记词，通过象物、象事、表意三种手段来记录词。随着词汇的日益丰富，表意造字法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于是，记词方式突破了表意字的局限，开始从语音方面着手写词，于是便产生了假借。假借方式着眼语音，思路可取，但却有记音不准、手段不经济、假借字与被假借字时常纠葛等诸多弊端，是一种消极方法。由之而来便产生形声方式，取假借之长，避假借之短，成为一种较为理想的记词方式。

这种看似静态写，实为动态画踪；虽为动态画踪，又不失为静态描写的寓动于静、以动显静、静动胶合的叙述，给读者提供了从历时、共时两种剖面观察古汉语词汇书写方式的机会，体现了双线交互模式之一斑。

1·3该书非常注意多面兼顾。所谓面，是指在某一视点上的不同观察角度。事物本身就是多侧面的，因此在研究事物时也应当而且必须进行多侧面观察，这样才能反映出事物的全息面貌。

例如该书在探究词义发展演变的原因时，既考察了引起词义发展演变的诸多外部原因，如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变革、物质和文化的发展、思维和认识的发展以及心理作用和联想活动等，而且也条列了引起词义发展演变的内部原因，如词义系统对词义演变的

影响、语法的影响等。该书不仅探究了词义发展演变的原因,而且还以义位为基本单位描述了词的指称意义演变的五种结果(指称意义扩大;指称意义缩小;指称意义变易;指称意义转移;指称意义虚化)和词的附属意义演变的两种结果(词义褒贬色彩对换;中性词带上褒贬色彩)。

再如,该书不仅从古汉语词汇本身进行研究,而且还往往扩大视野,通过方言、现代汉语甚至其他民族语言来观察古汉语词汇。例如在谈到词汇消亡时,指出有些旧词在通语中消失了,但在某些方言中还保存着;某些旧词作为一个词消亡了,但在现代汉语中还以词语的身份存在着。在谈到词义的民族性时,把汉语的“天文”和“嫂”与英语的 *astronomg* 和 *Sisfer—in—law* 进行比较。

1·4表里璧合、双线交互和多面兼顾的特点,其实都蕴含着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当代学术的基本支柱,因此使《古汉语词汇学简论》表现出当代的学术意识。

当然,该书的系统观念不仅仅只表现在构架上,在许多具体论述和命题中也都表现出较强的系统意识。比如该书指出:“古汉语词汇是一个庞大、复杂而又自有其序列的总体。”(40页)“现实现象之间一般都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对立的关系,因而,以切分的方式反映现实现象的词义之间,一般也都有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对立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词义的系统性。”(117页)这说明该书作者的系统观念是自觉的。

二

《古汉语词汇学简论》所致力探索建构的框架之所以具有当代学术意识,除了它的系统观念之外,还因为它大量地吸收了当代语义学的新成果。

2·1该书的第二章谈古汉语词义,是很精彩的一章。精彩就精彩在本章把语义学理论引进古汉语词义研究。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乔姆斯基打破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使被忽视了数十年的语义问题又重新成为热门话题,而且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语义学家把音位理论巧妙地移植到语义研究领域,并以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思想为指导,建立起来了以义素分析为主要标志的当代语义学。当代语义学把词都放置在各个互有关系的语义场中,然后以区别性为原则,切分出构成词义的若干义素,义素是没有语音形式的最小语义单位。义素组合构成义项(或义位),义项与义项组合构成义丛或表述,从而达到揭示句义的目的。义素与义素、义项与义项等又有聚合关系。义素、义项(义位)、义丛、表述等一系列由小到大的语义单位以及它们之间不同的组合和聚合关系,就构成了当代语义学的内容。

毫无疑问,当代语义学使词汇研究(当然也包括语法等部门的研究)得到了深入发展,打破了以词素为基本单位的研究基点,深入到词义的底层;克服了只在基本词汇、一般词汇,同义词、反义词等领域兜圈子的局面,焕发了勃勃生机。

2·2周光庆同志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把当代语义学的成果植入古汉语词汇研究,在词义构成的论述中,正面论及了义素和义位,亦即该书所谓的“词义的微观结构”。在考察词义演变的结果时,以义位为基本单位来进行观察。而且后面以两节篇幅讨论词义的组合和聚合,颇有特色。

在引进语义学理论时，周光庆同志不是形其形，而是形其神。他没有在阐述概念上花费多大力气，而是结合古汉语词汇的实际，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发明语义学的精神。比如在谈词义组合时，他没有开列出各种组合模式的清单，没有介绍义丛等各种组合概念，而是词义对词义组合的制约作用上来进行考察，指出词义的切分对象对词义组合的制约，词义的对应关系对词义组合的制约，词的附属意义对词义组合的制约等多种情况，并且还回过头来论及了词义组合对词义的影响作用。前后照应，回还往复。因此，此书没有以理论面孔吓人之感，没有刻意标新之感，没有理论与实践脱节油离之感。

2·3理论是灰色的，任何一理论也不能包打天下。原封照搬理论是难以解决五彩缤纷的现实问题的。周光庆同志在引进语义学理论时，没有削足适履，让五彩缤纷的事实去服从灰色的理论，而是在解决事实问题时灵活地运用理论，甚至还多有创新。例如在谈到义素时，提出了“中心义素”、“限定义素”和“隐含义素”等概念，探讨了构成词义的不同义素的职能以及隐现情况。在一般的义素分析中，人们的着眼点多放在区别性义素亦即限定义素上，而周光庆同志在这里很有见地强调了中心义素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谈到，词义结构中的义素不是排列在同一水平线上的，而是有层次的。义素之间也有着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组合关系。虽然作者并未来得及阐明义素的层次和义素间互相关联、影响、制约的各种具体情况，但这也已经够可贵的了。

该书对于“义位变体”的论述也是很有新意的。义位在使用过程中，在不同的语流里，充满着变异的形式，这种变异形式被称作义位变体。义位变体的提出，不仅有利于解释词语在具体运用中的丰富多彩，有利于根据“语义中心”归纳义位，而且还能较好地解释语义的发展演变，因为“共时观察到的变异，就是将来历时上产生变化的苗头”（美国语言学家马提索夫语）义位的分化是从义位变体开始的。作者还深入探讨了由义位变体发展为新义位的两个条件：第一，在语言中经常使用，或者说经常出现在同一种语义组合结构之中，因而形成较为固定的意义，为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第二，脱离了原义位的语义中心，形成了自己的新的语义中心。（195页）

这一些新的研究，应该说对于语义学理论是有贡献的。

三

当代学术意识的一个显著特点，还表现在它的学术包容性上。当代科学不是要割断历史甚至反叛历史，而是要对历史进行批判反思，尽量把历史上的合理成份包容到自己的学术体系中。科学不仅要对着事物有着极大的解释力，而且还应对科学史上的各种学说有着极大的包容力。这种学术包容性在《古汉语词汇学简论》一书中也有较好的体现。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几千年来尚未出现一部成系统的古汉语词汇学框架，但却有着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丰绩。如果一个古汉语词汇学体系对前人的这些研究置之不理，或难以相容，那肯定不是一个较好的体系，起码来说不是一个理想的中国语言学界的古汉语词汇学体系。周光庆同志不仅把当代语义学理论引入古汉语词汇学研究，而且也较好地吸收继承了古贤今哲的关于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成果，要么扬其精而弃其粕，要么从新的角度给以新的解释，要么沿其路而深求索，尽量把它们安

置在新体系中的一个适当位置上,显示了学术上的包容性。

3·1传统把造字之法概括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现代文字学认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而转注可以归并到其它造字法中,假借则不是造字法而是用字法。周光庆同志从词的书写方式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内容,既不守六书成说,也不囿今人之见,但都吸收了他们的合理成分,用象物、象事、表意来重新安排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并给假借、形声以新的地位;此外还把关于孳乳字的问题放在书写方式的门下,可以说是独出心裁。

在语音造词中,提及了感叹说和摹声说。感叹说和摹声说作为对词语起源的解释显然是十分偏颇的,但是作为一种造词手段也还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因此作者把此二者限定在造词范围内是很合适的。而且在论述中,还吸收了张世禄《国语叹词的研究》的结论,把古汉语感叹词分为“情绪较多地倾注在韵母元音上”和“情绪较多地倾注在声母辅音上”两类。在摹声造词中,不仅吸收了列维·布留尔、章太炎、张行孚、刘师培、潘尊行等人的思想或成果,而且还涉及了摹声构造动词的问题,同时也点出古人论述虽有启发意义,“但又多少都有些猜测玄想的意味,结论未免有失偏颇,我们对此是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的。”(76页)

3·2从新的角度来对前人成果给以解释的情况也随处可见。比如古有“义通”之说,影响很大,为后人所重视。周光庆同志认为,“所谓‘义通’,实际上是指几个词的意义有共同特征,并且互相关联,因而有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通用的现象”(218页)因此义通是词义聚合关系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把义通现象放在词义聚合这种新的框架中进行解释,作为古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一个“切片”来看待,使这种现象明晰化了。

3·3在吸收古人成果的同时,周光庆同志往往还能循其思路,深入发掘,道前人所未道,发前人所未发。关于词义派生的比喻、借代、引申三种方式是谈得最细致的。关于比喻的方式,他指出了“利用事物形貌、性状相似进行比喻”、“利用事物方位、处境相似进行比喻”、“利用事物功能、作用相似进行比喻”、“利用动作行为的方式特点相似进行比喻”等四种情况。关于借代的方式,条列了六种不同的情况。关于引申的方式枚举了五种不同情况。例证的详备,论述的深入细微,读后令人拍案。

纵览全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书把前人关于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成果几乎都论及到了,并且承前而不泥于前,把这些成果放在体系的系统中去考察,以新的语言学理论去衡量,或取或去,或修正,或发展,这种学术包容力不仅显示了作者的功底,而且也给他所致力探索建立的框架以历史的厚度和旺盛的生命力。

四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在荒原上耕耘的人,避免不了有疏漏和顾及不到的地方。本人不敏,无力拾遗补缺,这里只就本人感受到的不足之处谈一谈。

4·1作者在引进语义学理论时,似乎对于语义场的问题重视不够。能对词义进行义素分析,关键在于有语义场的存在,因为脱离开语义场可以说一个词义可以进行无限切分,因此而无法对义素进行描述。语义场规定了切分限度,即只要把同场词的词义能够区分开来就行了。因此,义素分析非常重视区别性语义特征。比如在亲属语义场中,“人”

这个义素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义素,甚至可以不考虑,因为这一义素对区别亲属语义场中的词不起作用,虽然所有亲属语义场中的词都具有〔+人〕这一义素。但是,若是在动物语义场中,“人”这一义素就是异常重要的了,它可以把高级动物“人”同其他动物区分开。该书在论述义素时,没有明确地论述这一点,实乃白玉之瑕。

再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语义场问题又是一个关于聚合的问题。每一个语义场都有一个统帅全场词的义素存在,这一义素把若干词聚合到一个场中。如“亲属”这一义素,把所有的亲属词聚合到亲属语义场中,“有生”这一义素,把所有的表示有生命事物的词聚合到生命语义场中。义素的不同,常使得各种语义场相互交叉或包容,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从义素分析角度看,同义词和反义词只是两种特殊的语义场,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是具有一个或几个相同义素,并具有一个或几个不同义素。而且,同义词、反义词同其他词场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正是作者对语义场问题重视不够,所以语义的聚合一节似乎写得较为平淡,没有揭示出语义聚合的全貌,读起来不大够劲。

4·2在一些具体论述中似乎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斟酌或完善的地方。比如关于词义概括性和具体性关系的论述,还不够明确。其实词义概括性是就语言平面而言的。词义具体性是就言语平面而言的。二者的辩证关系表现为语言和言语两个平面的辩证关系。

作者在第46页正确地区分了“迭音词”和“重叠词”。但是对于“重叠词”的身份并未给以界定。重叠词究竟是相同语素构成的一个词呢,还是一个词的重叠使用形式呢?若是前者,那么在构词方式中就应该论及。统观全件,作者似乎是把重叠词作后者看,也就是认为“重叠词”不是词,而是词的重叠使用,或者是词组。为了让读者易于明白,作者似乎应对此有个明确的表态。

上文已经指出,作者以义位为基本单位来观察词义的发展变化,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从义素的增减变易来观察词义的发展变化,也许可以抓到更为本质的东西,也许那样可以对于指称意义的扩缩易移虚化等现象会有一些更深刻更新颖更富规律性的认识,而且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作者在每种演变的结尾处都或多或少地指出了这些变化同义素增减变易的对应关系。可惜没有以义素变化为经来纬织。

4·3此外,此书在编排上似乎也有待改进的地方。地方说《目录》似乎就显得太简略了,难以通过它来窥观全豹。结尾也许太仓促了点,需要有一个画龙点睛的总结。而且许多段落过长,序号排列隐匿文中,阅读起来多少也有些不便。书后若能附上一个参考书目或是主题索引,也许更好一些。

尽管如此,还是瑕不掩玉。该书带着明显的当代学术意识、以系统论思想作指导、以当代语义学理论为武装、以传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为建立起古汉语词汇学体系作出了非常可贵的探索,而且已初具雏形。我们期待着周光庆同志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这一探索行列,使古汉语词汇学体系早日建立起来并逐步发展和完善。